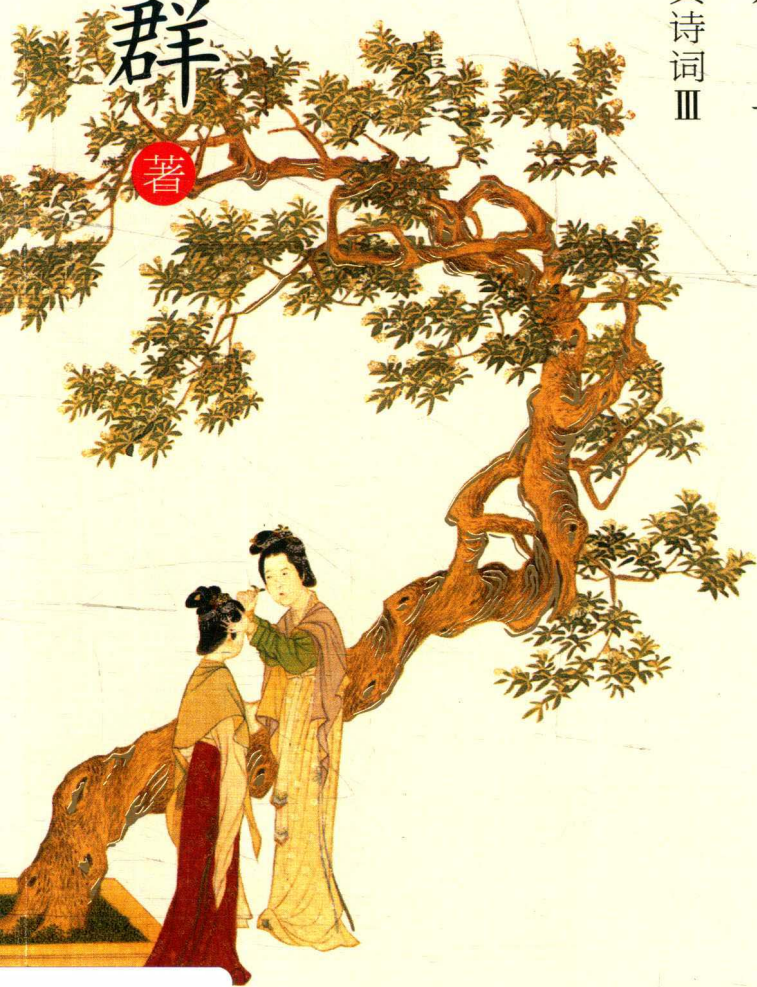


人间烟火 皆是诗

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Ⅲ

王立群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人间烟火 皆是诗

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Ⅲ

王立群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烟火皆是诗：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 Ⅲ / 王立群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6

ISBN 978-7-5711-0179-4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宋诗—诗歌欣赏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6732 号

RENJIAN YANHUO JIE SHI SHI

人间烟火皆是诗

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Ⅲ

王立群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李小希
责任校对 毛路 牛志远
书籍设计 王莉娟
插图绘画 寇衡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 450016)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不经意间，把日子过成了诗（代序）



南宋初年有一个叫史尧弼的文人，说过这样的话：“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策问》）这里的“文物”，指的是文士、文章。比史尧弼稍晚一点的陆游也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殆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吕居仁集序》）他们两个人讲的是从北宋初年到南宋初年的情形。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则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朱子编纂《楚辞后语》的时候，已是南宋末期，因此，朱熹所言基本覆盖两宋时段。

说这些话的都是宋人，他们所感所言是不是自吹自擂、言过其实？显然不是。近代的两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也都说过类似的话。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陈寅恪说的流传更广：“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生于南宋覆亡六百年之后，当他们重新审视宋代

文化成就的时候，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自然也把元、明、清置于一起加以比较，也就是说，两宋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

这是共识、定论，对此没有多少人持相左的意见。

是不是由此前提可以如此推理，作为宋代文化之一的宋诗，也达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呢？令人吃惊的是，对此则聚讼不已。

南宋晚期的诗论家严羽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理解，领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师，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沧浪诗话·诗辨》）

比严羽稍晚的金代王若虚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文辨》四）明人陈子龙认为：“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一言理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王介人《诗余序》）这不单是

轻视宋诗的问题，在他们眼中，宋诗不仅不好，而且根本就不配称为诗。

他们认为，宋代文学的典范是宋词。金代的刘祁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归潜志》卷十三）

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古今词统》序言中说：“诗工于唐，词盛于宋，至我明诗道振而词道阙。”（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窃意汉人

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钱允治《国朝诗余序》）这种类似的认识在近代的王国

维则进一步发展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这其中提及的能够代表宋代文学的是宋词，并未言及宋诗。

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致杨霁云》）鲁迅此

言虽是对他人称誉自己诗歌的谦辞，但也基本代表了他内心深处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潜在认识，“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论断，也经常被人引用。言外之意，宋诗不好，不如唐诗。

宋诗果真如此不堪吗？

单以数量而论，楚辞、汉赋、元曲数量皆远不及宋诗，此不必细说，而世人则常将唐诗、宋诗相提并论。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等统计，唐代诗人数量约三千左右，现存的唐诗一共有五万五千多首。据《全宋诗》《全宋诗辑补》的统计，作者超万人，诗歌数量超过二十七万首，数量差不多是唐诗的五倍。清代的厉鹗说：“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厉鹗《宋诗纪事·序》）厉鹗仅言诗人之多远超唐代，实际上，诗作数量方面更是甩了唐人不知几条街。至于被后人视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作者也不过一千四百余人，数量两万余首（据唐圭璋《全宋词》、孔凡礼《全宋词补辑》），数量不及宋诗十一。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但所谓类似“孤篇压倒全唐”“一句顶一万句”“一首顶一万首”的论断也未免过于夸张。宋代诗人的数量、宋代诗歌的数量至少可以说明，宋诗之繁盛远盛于前面的唐诗，也远盛于同时代的宋词。王国维的经典论断，着意于变，意在突出一个时期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为其宋元戏曲研究开路而已。

说到底，尽管宋词被王国维视为宋代文学之代表，但真正能够代表宋代文化精神的，还是宋诗。宋人生唐后，开辟虽难，但正是因为唐诗耀眼光芒的存在，宋人才努力开拓，竭力突围，使宋诗实现了真正的繁荣。唐诗宋诗，无所谓孰高孰低、谁优谁劣，在中国诗歌史上，

可谓双峰并峙，各领风骚。至于世人多尊唐而黜宋的根本原因，不外束宋诗于高阁，人云亦云而已。清人吴之振对此现象看得透透的，他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宋诗钞》吴之振序）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没有全面阅读、仔细体会宋诗的前提下，妄言宋诗不好、断言宋诗不如唐诗等，都是不客观的。这也正是我在解读了部分宋词后，又想分享一些宋诗的根本原因。

唐诗好，宋诗也不差；唐诗美，宋诗也很漂亮。宋人“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缪越《论宋诗》）。唐诗没有讲的，宋诗给讲了；唐诗没有说透的，宋诗说尽了。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说，宋诗的出现与繁荣，是对唐诗的全面继承、全面开拓，因此说，宋诗、唐诗，至少并驾齐驱，若论发展，甚或过之。当然，宋诗中不乏失败的作品，唐诗中也难免平庸之作。不能拿宋诗中的普通文字与唐诗中的上乘作品进行比较，反之亦然。

大要言之，宋诗之美，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宋诗之美，美在文化。严羽批评宋人“以才学为诗”，后人鄙视宋人诗歌“掉书袋”，其实，这正是宋诗之美的一个表征。比较而言，宋人更有条件（有时间、有保障、有文献、有地位，等等）接受古代的一切知识，丰厚的学识是宋诗构成的基础。诗歌本身是一种短小的文体，五言绝句二十字，七言绝句二十八字，五言律诗四十字，七言律诗五十六字，古诗可以稍长一点，但也长不到哪里去，至于长篇的叙事诗，少之又少。如何在有限的字数内表达尽量丰富的意义，

这就需要知识，需要文化的积累。宋人在这方面有其特长，以才学为诗也就顺理成章，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用典。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同理，“诗有典故意自丰”。这也是有些人不喜欢宋诗的原因，因为阅读宋诗，的确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的，否则，很难透彻理解诗人之心。但也正因为用典，宋诗具备了无穷的魅力。

从阅读接受层面而言，一个读者，面对一首诗歌，倘若一眼看穿，了无剩义，其阅读体验必定是“这首诗很一般”；但倘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还看不出这首诗到底说的是什么，其阅读感受要么是这首诗不得了，要么是这首诗胡乱说，总之是阅读遇到了阻碍。一个文本，不经过读者的阅读，就不能被称为作品，文本的意义也不复存在。最理想的状态是，一首诗歌，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既有相合之处，又在意料之外，具体在用典上，要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还要尽力不着痕迹。钱锺书说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是比较健康的用典的范例，黄庭坚《登快阁》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何尝不是如此？不依赖丰富的知识积累，也能大致领会诗人之心，加以探索，会更加深刻地走入诗人之心。既非一览无余，也非此路不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皱眉想想，颌首会心，这是何等痛苦又愉快的阅读体验！难道说这样的宋诗不美？宋代诗人所努力追求的，也是这个方向。因此，可以如此说，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文人之诗、是学者之诗。

第二，宋诗之美，美在理趣。诗言志，诗缘情。诗歌要么抒发抱负，要么书写情感。用诗歌来说理，东晋时期的玄言诗已经证明是很难成功的。东晋人没有做好的，唐人没做的，宋人做了，而且做好了。宋诗不但有“理”，而且有“趣”，这成为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宋

诗独特的美，也通过这类诗展现出来。

一首诗歌可以包含多层意义：一是诗歌的字面意义，二是诗人的寄托意义，三是普遍性的、终极的意义。前两者是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必须具备的，但第三个方面，则并非每首诗歌都存在，宋诗的理趣恰恰在这一方面下足了功夫。清代的翁方纲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石洲诗话》卷四）

宋诗中成功的说理诗是通过具体的意象及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议论、比喻等多种方式来展现的，并非纯粹的就理说理，“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因此就避免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毛病，而成为展现个人内心、人生与世界、宇宙一体通透性理趣的恰当样式。比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写“观书”的感受，因为借助了具体的形象与比喻的手法，因此表达了多重的意义：池塘有活水注入才能时刻保持清澈，读书要不断接受新知识才能思想常新，心性要不断探究才能永葆纯粹，个人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进步。总之，将具体的行为、经历、意象与道、理联系起来，诗歌便能够表达某种普遍性的意义，值得反复咀嚼、品咂。

再如，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澠池怀旧》），陈师

道的“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绝句》），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寒菊》），等等。把具体的意象、人生的经历、偶然的事件、个人的感悟，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性情感，诗歌便具备了永恒的意义。

尽管程朱理学到元明的时候才真正获得崇高的地位，但宋代文人，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一直到南宋的朱熹，对天、气、理、欲的理论思考与探究一直没有间断。翻一翻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这种认识会更加深刻。因此，在两宋，理学是作为某种深层文化背景而存在的，生活于两宋的文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其影响，即使不是纯粹地阐述理学、道学，写景、记游乃至日常生活的诗文中，也难免有悟道、明理的影子。如《千家诗》第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闲适，是悟道的前提；这种闲适之乐，是道学家对平淡自然境界的追求。

第三，宋诗之美，美在翻新。江西诗派追求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主要指用典、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创新，这自不待言。宋人对传统题材重新审视，善于翻新，翻出新意，这也是宋诗之美的来源。从读者方面而言，传统题材的阅读心理期待，到了宋人的诗歌中，感觉时时被当头一棒，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故能获得一种崭新的审

美体验。例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换一个视角，对昭君出塞、项羽乌江自刎事件重新审视。题材是传统的，但眼界是另类的，立意自然迥异于前人，正因如此，当时的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皆有和诗，纷纷发表不同的见解。高步瀛说王安石《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持论乖戾”（《唐宋诗举要》卷三），其实也是针对其标新立异、善于翻案方面而言的。

再如王安石的《钟山即事》云：“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全诗写“幽静”，涧水静静地流，春风轻轻地吹，人对茅檐静坐终日，山中幽幽一鸟不鸣。最后一句“一鸟不鸣山更幽”，前人多有讥讽，说一鸟不鸣，当然幽静，还用多说，这是模仿的失败。其实，这句正是此诗的精妙之处。前人写静，擅用反衬，总喜欢在静静的氛围中弄出一点声音来，这样才显得更静。如南朝萧梁王籍《入若耶溪》用蝉鸣、鸟鸣反衬山林的幽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唐人王维《鸟鸣涧》也是同样写法：“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此写得多了，就形成一个套路，与人的阅读期待完全相合，并不能产生新的审美体验。王安石此句正是对以往惯用的写作技巧熟滥的背离，又回归到最初的原始状态，用“一鸟不鸣山更幽”写静，其实背后包含了这样一个历程：一鸟不鸣山更幽（自然状态）——一鸟鸣山更幽（推翻自然，文学衬托）——一鸟不鸣山更幽（推翻前者，重归自然）。读者的阅读，必须经历中间的“鸟鸣山更幽”阶段后才能真正领悟王安石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新变。批评者无视、忽略了中间的传承，将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一鸟不鸣山更幽”画上等号，故有“何用多言”之说。这不但误解了王安石，也体验不到宋诗的领异标新之美。

第四，宋诗之美，美在世俗。如果说唐诗在“天上”，那么宋诗在“人间”。唐诗爱写豪迈浪漫，爱写人生的不平凡，与日常生活有距离，高于生活；宋诗更喜欢写日常生活的平淡、人生的平凡与普普通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苏轼被贬儋州时，结交了四个姓黎的朋友，写过《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一组诗，其中第一首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诗人喝得半醉半醒，遍访四位好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幸亏有“路标”——牛矢。牛矢就是牛粪，沿着牛矢能走到牛栏，家还在牛栏西很远很远。这首诗浅白，写的就是苏轼某一天的生活——喝酒、访友、回家、迷路，沿着牛矢走到牛栏。走到牛栏以后呢？没写。苏轼写的是一种半醉半醒的生活状态，写得很认真，尤其是写了“牛矢”，原生态、真实，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粗俗，但正是从“牛矢”中，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味道”。

田间地头、篱落小巷、山谷炊烟、鸡啼蛙鸣、黄昏落日、暴风骤雨、暗香浮动、陌上花开、一室之内、一画之中、一方池塘、一眼清泉……这是人间的生活，也是世俗的日子。平淡的日子，平凡的人生，过得真实，过得认真，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在宋诗中随处可寻。陆游客居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王安石闲居金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书湖阴先生壁》）。杨万里午休起来，“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心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赵师秀夜半等客，“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约客》）。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更是写尽了农民

一年四时的真实生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流淌的岁月、宋人的山河和不屈的魂灵。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事的时候做事，没事的时候读书。宋诗的日常性、世俗性，促成了宋诗文化性、理趣性的生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人把读书看成生活的一部分，把生活活出了趣味。在平凡的日子里，在不经意间，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诗。



欧阳修	戏答元珍	001
王安石	乌江亭	008
王安石	明妃曲（其一）	015
王安石	元日	023
王安石	泊船瓜洲	030
王安石	梅花	037
王安石	北陂杏花	044
苏轼	和子由澠池怀旧	053
苏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061
苏轼	海棠	068
苏轼	题西林壁	077
苏轼	惠崇春江晓景（二首）	085
苏轼	赠刘景文	093
苏轼	和董传留别	099

黄庭坚	寄黄几复	105
黄庭坚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113
黄庭坚	登快阁	121
李清照	夏日绝句	130
陆 游	游山西村	136
陆 游	临安春雨初霁	142
陆 游	书愤	149
陆 游	沈园（二首）	155
范成大	四时田园杂兴（“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七）	163
范成大	州桥	168
范成大	双庙	174
杨万里	小池	178
杨万里	初入淮河四绝句（选三）	183
朱 熹	春日	188
朱 熹	观书有感（二首）	194
林 升	题临安邸	201
文天祥	过零丁洋	208
后记		214

残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
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
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
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一生三次遭贬，这首七言律诗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时所作。《千家诗》亦收入此诗，题目作《答丁元珍》。

题目中的“戏”字义为“戏作”，其实是诗人借以掩盖自己真实想法的一种障眼法。“元珍”是作者的朋友，姓丁，名宝臣，字元珍，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当时是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的军事判官。

欧阳修四岁丧父，童年生活非常艰苦，靠着母亲以芦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认字（沙滩画荻），开始了一生的读书生涯。经过八年的学习，他终于在天圣八年（1030）的春天考中进士，任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

宋仁宗景祐元年，欧阳修调任京城任馆阁。在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给范仲淹写了《上范司谏书》，在信中他说：司谏品位虽低，但岗位很重要，因为能和皇帝讨论大事，能纠正天子之失。接下来，年轻气盛的欧阳修话锋一转，直言道：自从知道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期盼着有您在朝廷上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传来，可是您一点儿有用的言论都没发表。希望您真能向朝廷进言，办点实事啊！这封书信出自公心，写得恳切，打动了一腔热血想干点实事的范仲淹。这才有了后来的庆历革新。范仲淹非常欣赏欧阳修